

和讯网 主编

名家谈

金融风暴后的 中国经济

美国、欧洲等的经济会进一步下滑吗？贸易保护主义会沉渣泛起吗？中国经济会率先回暖并带动全球经济回暖吗？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想知道却无法得到确切答案的问题。对此，和讯网评论频道启动了中国经济与民生大型系列访谈节目，邀请周瑞金、陈志武、迟福林、党国英、陈东升、华生、曹凤岐、刘纪鹏、袁钢明、焦瑾璞、王连洲、汤敏、梁小民、李昌平、吴晓波等众多名家对这些热点话题做最深入的探讨。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和讯网 主编

名家谈

金融风暴后的 中国经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家谈金融风暴后的中国经济 / 和讯网主编.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308 - 06955 - 7

I. 名… II. 和… III. 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8758 号

名家谈金融风暴后的中国经济

和讯网 主编

责任编辑 赵 琼

装帧设计 高海云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94 千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6955 - 7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序言 当金融风暴肆虐全球，中国向何处去？

2008年，无论对中国还是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三十年前，中国开启了一场名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航程。在解开了束缚其身上层层枷锁之后，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所蕴藏的巨大能量被完全释放了出来，中国由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国度一跃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强国。中国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中国融入世界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触动世界各国的神经。

然而，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们发现改革已经越来越艰难：经济改革暗礁密布，政治改革尚待破题，社会改革举步维艰，国际环境更为复杂，各种各样的矛盾似乎在改革三十年之际开始集中显现出来。此时的中国，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到底该如何看待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究竟是前进中正常的障碍还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已经发生了偏差？我们是应该暂时停下脚步来好好地消化一下改革的成果还是直接将改革继续下去？下一个三十年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一场从大洋彼岸席卷而来的金融风暴，使得中国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遏制经济增速快速下滑？如何推动大量处于困境中的外向型企业尽快转型？如何创造更多的新就业机会？……

当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中国将向何处去？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危机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就此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那这一次又将会怎样呢？这可能是无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关心的问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2009年全国两会结束，和讯网相继约请了各相关领域的诸多一流学者专家，就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众多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系列地进行了近百场访谈。系列访谈推出后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百万网友积极留言和参与讨论，其中大量内容被主流传统媒体转载和引用，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热议。

同时，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高校学生了解并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将系列访谈中的八场以论坛的形式在首都五所著名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举办，著名学者的演讲受到了高校学子们的热情追捧。

策划并推出这个系列访谈及高校论坛，源于和讯网独树一帜的编辑理念。和讯网作为中国最早、用户最多的网络财经资讯提供商，不仅致力于聚焦投资领域，形而下地为用户提供迅捷和丰富的投资信息，而且也有责任利用强大的专家和机构资源，形而上地为用户提供更为宏观和权威的资讯，诸如政策解读、时事分析、背景透视等等。正是这种执著的努力，和讯网在受到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业界青睐的同时，也受到媒体界、研究机构、资本和金融市场监管层的持续关注，目前拥有相对高端的上千万独立用户，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财经网站。

各位读者手中的这本访谈集，正是此次系列访谈及高校论坛最精彩的内容。几十位顶尖学者从各个层面深入剖析了中国改革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各种困难及其成因，并明确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希望这些顶尖学者的智慧能给我们以启迪，并能给相关决策者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如果能这样，也就达到我们出版本书的目的了。

在此，我们需要特别感谢参与此次系列访谈及高校论坛的专家学者以及和讯网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相关编辑们，正是他们的大力支持和辛苦劳动，本书才能及时出现在各位读者手中。

和讯网董事长兼 CEO 章知方

2009年6月15日于北京

目 录

经 济 篇

- 3 陈志武 改革其实很简单的事
- 10 周瑞金 改革的“方向之争” 是进行利益格局调整
- 17 党国英 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改革
- 28 刘纪鹏 中国三十年改革成功的钥匙
- 36 陈东升 改革开放唤醒“中国梦”
- 41 华 生 中国又面临重大道路选择
- 45 李向阳 全球实体经济的冬天刚刚开始
- 53 曹凤岐 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全世界承担后果
- 57 迟福林 金融危机暴露中国增长方式缺陷
- 65 焦瑾璞 政府在市场失灵时不能放任不顾
- 73 宁向东 警惕全球危机对中国企业的第三轮洗牌
- 78 谭雅玲 人民币单边升值对中国经济全球化弊大于利
- 87 黄卫平 我国贸易摩擦本质是市场无序
- 95 郑超愚 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仍有高速增长潜力
- 100 高辉清 中国经济可以走出相对独立的行情
- 107 贺力平 中国金融机构没有抄底华尔街的能力
- 115 陈克新 抄底华尔街不如抄底资源实业
- 122 郭田勇 思辨中国金融改革的“得”与“失”
- 130 杜晓山 农村金融机构缺乏服务意愿

- 138 徐璋勇 “大小非”是 A 股头上的一把利剑
- 147 刘煜辉 流动性充分导致股市大涨
- 156 郝演苏 中国保险投资渠道不能完全开放
- 163 王连洲 刘煜辉 基金公司存在垄断暴利
- 173 吴汉洪 《反垄断法》不能完全根除行政性垄断
- 181 梁小民 国资流失的深层问题
- 189 张文魁 产权民间化、治理商业化是国企改革的一道路
- 197 吴晓波 不解决好民企问题，改革不算成功
- 204 李义平 从紧货币政策使民营企业融资难
- 211 张德勇 秋 风 2000 亿地方债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次试水

民 生 篇

- 223 袁钢明 到让大多数人“后富”的时候了
- 231 张燕生 张 明 应坚定不移地转向内需立国的发展战略
- 242 孔祥智 “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农民问题
- 250 李昌平 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还权于农民
- 259 钱克明 徐小青 粮价涨跌中国农民都没赚到钱
- 268 张 琦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朝城乡“公平化”方向发展
- 276 顾云昌 平抑房价必须从供求两个方面进行调整
- 281 唐 钧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是导致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
- 289 米 红 我国失业金和再就业基金还未发挥应有功效
- 297 汤 敏 建立服务业社会保障可缓就业之急
- 305 李迎生 推行全覆盖难在农民对社保制度缺乏信心
- 313 程方平 大学生就业难题，高校无法独力解决

名家谈金融风暴后的中国经济

经济篇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访问教授。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研究领域为资本市场、宏观经济以及金融发展史。

访谈背景 3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出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评价这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到底得益于什么？该如何解决当前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的改革到底应该向何处去？这些都是我们当前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改革其实就是把对人们的各种束缚解开

和讯网：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可以说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分歧，从整体上你怎么评价我们这30年的改革开放？

陈志武：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对于我们这些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人来说，从头到尾都经历过、看到了，对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况也大概有所了解。1978年的时候我正好是高中毕业，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我觉得改革前后最大的基本差别是，还回给个人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多。就像中国政法大学一位教授所说，3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把每个人想要做什么的手脚放开，给每个人更大的工作自由，可以做学者、工程师、官员，要创业也可以。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农村，农民生产什么，受到严格的控制和管制。但是从1978年、1979年开始，农民通过包产到户，生产什么可以自己选定。生产好了，到哪里去卖？最开始的时候粮食要送到国家粮站，肉猪必须卖给当地的政府肉站，都由国家按照计划价格统一买过去。但是后来，你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拿到哪里去卖、按照什么价格去卖，等等，这些都放开了。

改革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就是把以前方方面面规定人们不能做事的束缚解开，让人

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按照更自然的方式实现，回归到本来应该有的状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应该享有一些最基本的权利、最基本的自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自由都被拿掉了，不仅没有找工作的自由，在社会生活方面也没有自由，比如说结婚、住房等等。现在关于房地产的争论很多，大家都说房价太高买不起。在我看来跟1978年、1979年甚至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相比这还是好的，可以说这是个“富贵病”，大家都希望得到更好的房子，改善居住条件。原来大家对此是不敢想像的，那个时候要得到自己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只有一条路，就是结婚。

所以，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有很多为了分一套房子而勉强结婚的人，现在想一下，住房市场自由化以后，用不着为分房子而随便跟一个人结婚。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大学刚刚毕业、研究生刚刚毕业就买了自己的房子，有了房子以后再去找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这跟原来为了一间小小的房子（没有自己的厨房，没有自己的卫生间）而随便跟一个人结婚简直有了天壤之别，这对个人的生活来说是有了根本的变化。市场化发展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这么具体！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20世纪70年代起给街上过往的人随机拍一些照片，看他的面部表情是什么样的，每个月都拍几张这样的照片，按一个时间序列一直拍到今年。如果真有这样的照片，大家会看到，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不只是房子多了，汽车多了，收入水平增长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好多了。

“中国奇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科技进步及国际贸易新秩序

和讯网：这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如你刚才所描述的一样，让整个社会包括每一个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很多人都说是一个奇迹。但是也有人通过横向对比后认为，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并没有多么了不起，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志武：我们搞经济研究的人总喜欢用一些数据，我知道现在国内很多的学者，青年或老年的学者、业余爱好者等等，说中国是为了GDP而GDP，这本身不好，我也赞成这种观点。我也认识到，为了更精确地判断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我们需要更多的指标，GDP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但这个指标跟其他我们更关心的一些指标的关系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要强调一下，不应为了GDP而GDP，但是从GDP本身来看的话，根据实际购买力算，198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450美元左右，到了现在大概是8000多美元。这个不是按照官方的汇率计算的，但的确是翻了很多倍。

易改革，使市场的全球化发生突破性变化，这些当然加快了中国的追赶速度，肯定比 50 年前选择发展的日本等亚洲国家能更快赶上。

今天中国的 GDP 中大概有超过 85% 是来源于鸦片战争后进入中国的方方面面的新技术，不管是现在用的电脑，还是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电力。我们都说国家电力公司、华能、中移动、中石油、中石化等等，其中中石油去年一年的收入是 8000 多亿元人民币。所有这些大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管是百度、无锡尚德，还是其他我们熟悉的民营公司，都是围绕着从西方引进的新产业。这些 GDP 内容都受益于工业革命带来的“便车”。

和讯网：所以，可以说“中国奇迹”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全球科技的进步。

陈志武：还有就是得益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新的国际秩序。

和讯网：在改革开放 30 年的过程中，我们作出了很多很好的决策，但是也不可避免有很多的失误，你认为这 30 年我们有哪些重大的失误？

陈志武：我觉得要谈重大失误的话，就要回到杨小凯先生和林毅夫先生当时的辩论，即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问题。中国过去 30 年改革开放的成就，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模仿、引进成熟的技术，让中国能够比原来更加充分地利用廉价劳动力，让中国变成世界工厂，通过我们的人力优势，借用总体的发展机会搭上世界全球化的便车，让中国在 30 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均 GDP 好几倍的增长，这就是后发优势。

但是，正因为通过模仿可以让中国发展这么快，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增加这么多的总量，来得太容易就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感觉所有的成就都是因为自己，而没有外来的部分，不是别人作了很多基础性的发展和世界贸易秩序方面的积淀给我们提供的结果。于是，基础性改革就没有动力了。

和讯网：现在有人经常拿中国跟印度比，说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他们比我们基础要好，但现在发展得远远不如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民主等这些东西。

陈志武：这一点我跟一些学者、朋友交流的也比较多。正因为总体讲，人不可避免地有行为偏差，比如说“不见棺材不掉泪”，确实是这样的，没有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压力，就不会选择改变现状。

过去 200 年西方国家工业发展，带来的贸易机会和国际贸易的秩序，不只是给中国提供了机会，也给印度、俄罗斯、越南等各个国家都提供了机会。为什么印度没有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90 年代初利用这些机会，而中国在 70 年代末、80 年代、90 年代，2001 年加入 WTO 利用了这些机会呢？恰恰是因为印度从 1947 年独立以后建立了民主体系，使得印度在 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都没有经历过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化大革命”。

民主制的特色之一就是让一个国家的决策不是几个人说了算，而是让大多数人说了算。人都比较偏好稳定而不喜欢变化，所以，如果你想很大大地改革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会跟民主制度就会有一定的矛盾。

1980年，按照实际购买力平价算，印度人均GDP差不多是680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大概是440—450美元，印度的人均GDP比中国高50%左右。他们当时的收入比中国要好，而且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所以，那时候，跟中国比，他们不太容易有改革的动力。一直到1992年印度才放弃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是中国在80年代发展这么快、发展这么多，给印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才选择改革。人类社会就是这样，有时候有了危机才开始产生所谓改革的共识，并接受这种变化。

农村改革的关键是让农民走出农村

和讯网：我们国家的改革最早是从农村开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最早的改革确实让农村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但现在来看，农村的情况不是很好，如严重的“四农”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陈志武：原因有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简单讲。农村问题、农民收入的问题，只有通过城市化，让他们进入城市，找到非农工作，才是唯一根本的出路。

大致说，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很明显的，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限制，到现在出生在农村的人要进入城市、拿到城市户口还是有很多障碍。虽然跟前些年相比已经好多了，但是今天真正的农村人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就业的时候，他们就没办法真正落户，小孩也不能跟城市小孩享受同样的待遇。

这些是制度性障碍。现在城市、农村之间在受教育和就业方面的差别比1978年、1979年大多了，素质方面、机会方面的鸿沟使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这是农村跟城市比在过去20多年越来越差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农业的发展极限。农村主要生产粮食和蔬菜，农村可以发展得很快，甚至也可以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生产的蔬菜品种也越来越多，但是每个人每天需要的热量就是3000卡路里，不能说因为你能生产更多粮食、有更多钱就可以每天吃20顿饭，人对食物的要求存在一个上限。你可以在猪肉、牛肉、鸡肉、鱼、蔬菜之间找不同的搭配，但是，还是没办法超越3000卡路里这个热量上限。

任何一个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占GDP的比重肯定只会越来越小。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占中国的GDP大约是70%左右，现在大约是12%。

农业跟计算机制造、软件开发、互联网等这样的新兴行业不一样，计算机制造、软件开发没有取代什么原来的工业，互联网也没有取代任何传统工业。所以有了计算机制造、软件开发、互联网等这样新的行业，有了汽车行业，对 GDP 是纯粹新的贡献，是新的成分，没有取代任何原有既定的 GDP 成分。而农业则不同，是替换式的，有了一种新粮食、新蔬菜、新肉类，就必然取代某种现存的食物。所以，为了解决农民的问题，就是要让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找到非农就业。

国企不退使中国增长模式无法改变

和讯网：以前我们有个改革方向是“国退民进”，我记得 20 世纪 90 年代吴敬琏老师有个课题就是这个。但现在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民营企业办得越来越艰难，少数垄断性国企的利润可能就占了全国企业盈利的绝大部分，为什么会这样？这对我们的经济、社会意味着什么？

陈志武：这一点不奇怪，也是杨小凯讲的后发劣势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因为你想想，国有企业是有国家背景的，它们背后的股东——国家可以合法地改变规则，改变法律，还掌握着规则的解释权和执行权。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行业里只要有国有企业存在，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法治建设必然会越来越困难。

这个道理很简单，法治的特点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一个国有企业跟一个民营企业发生诉讼，前者背后的股东是国家，后者背后的股东是私人，两者在法庭面前，谁能得到更多的保护？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这几年一直强调，国有企业是不是要民营化、私有化，不仅仅跟国有企业效率高还是民营企业效率更高有关，更跟一个人花自己的钱心疼还是花别人的钱心疼有关。除此以外，跟其对法治发展的影响非常相关。所以，国有企业一定要从很多经济领域里面退出来，通过国退让民进来。如果不这样做，到最后：第一，各行业的法制、整个社会的法制很难发展，因为有了特权企业在，真正民营企业的日子就没办法过了。第二，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模式，都会带来非常大的扭曲。

最近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如果由国家掌握社会主要的资源、资产和财富，同时也由国家独享这些资产的收入和增值，再加上政府税收，那么，只会强化政府在中国经济的消费和投资决策中的垄断地位，抑制民间消费的增长、抑制民间投资的增长。必然的结果是，让中国经济增长继续靠政府投资而不是靠民间消费，继续靠出口而不是靠内需。因为如果要增加民间消费，你首先就要给他们更多的财富、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否则，民间消费怎么上来？

如果继续让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唱主角，保留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话，经济增长只能靠投资，靠高污染的重工业项目。

但是这种增长模式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目前全球经济危机之下，依靠投资加出口的模式在过去 30 年也许可以，但是在未来的可持续性是一个问题。

（主持人：郭哲，和讯网评论部）

改革的“方向之争”是进行利益格局调整

周瑞金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91年，在任职《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期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

访谈背景 改革开放的“方向之争”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定论，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意识形态纷争背后的实质问题？中国改革又将向何处去？

改革开放是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救赎

和讯网：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可以说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人们对改革的认识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周老师你从整体上怎么评价改革开放？

周瑞金：从整体上评价30年的改革开放，我有四句话：第一句话，改革开放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对中国向何处去作出的一个明智而艰难的抉择。我记得叶剑英同志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再不拐弯不行了。以邓小平、陈云、叶剑英和胡耀邦等人为代表，作出了抛弃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融入世界文明的选择。应该说，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第二句话，30年的改革开放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拯救。经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78年，我国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劳动者占社会总数的99.96%，城乡个体劳动者仅占0.04%，几乎是纯之又纯的公有制。结果呢？扼杀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活力，生活必需品、副食品，从粮食、棉布，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甚至小小的火柴，都要凭票供应，完全处于短缺经济的状态下。“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说明，“一大二公”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走不通的。

与此同时，我们在政治和文化体制上搞大一统的专权，不断通过整人的政治运动来解决我们的社会矛盾，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甚至一大批开国功臣也不能幸免。当这个体制走到尽头，不仅在经济上，在政治和文化上也难以为继。可以这